



论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的《元代文学史》

欧阳楨人

摘 要：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撰于 1957 年、著名文学史家吴志达先生修订于 2011—2012 年的《元代文学史》，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是两代学人的精神结晶。程先生为人正直而富于才情，吴先生为人厚道而精于史论，他们的灵魂与精神，才情与博学，珠联璧合，共同造就的《元代文学史》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文学史研究上的亮点，必将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代文学；元代文学史；程千帆

由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撰于 1957 年、著名文学史家吴志达先生修订于 2011—2012 年的《元代文学史》，前后跨越了半个多世纪，2013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上的特殊事件，也是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佳话，更是两代学人在历尽人生巨变之后而孜孜兀兀、专心于学术、薪火相传、慧命不息的确证，是他们的精神结晶。程先生为人正直而富于才情，吴先生为人厚道而精于史论，在经历了 56 年的尘封之后，他们的灵魂与精神，才情与博学，珠联璧合，共同造就了这部特殊的《元代文学史》。

—

这部《元代文学史》是程千帆先生 1957 年春夏间为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授课而编撰的讲义。当时，正值程先生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之际。他与刘永济先生同时被聘为《文学研究》（后改名为《文学评论》）编委，他和游国恩、林庚、浦江清、谭丕模、冯沅君、刘大杰、詹安泰、王季思等学术名流一同被高教部征聘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编委。程千帆先生和冯沅君、浦江清、王季思等几位教授在同一编写组，负责编写“宋元明清”这一段文学史，先后在北京、青岛（当时山东大学所在地）开过几次相关的学术会议，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专家们热情高涨，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决意为编写高质量的文学史贡献自己的才智。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过，他实际承担的编写任务是近代文学史，认为更富于挑战性。

但是，谁都没有料到，1957 年夏，风云突变，全国自上而下，掀起浩浩荡荡的“反右运动”。为人正直而才华横溢的程千帆先生在劫难逃，被打为武汉地区的大右派分子，被诬称为“右派元帅”（当时，武汉大学韩德培先生也被打成大右派，被诬称为“山中宰相”）。中山大学詹安泰先生也被打为右派，浦江清先生病逝，谭丕模先生也因故去世，全国的知名专家联手统编《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告吹，程先生连上课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元代文学史》讲义还没有印完就被迫终止了。嗣后，程先生先后被下放到八里湖、沙洋劳改农场，受尽各种人生凌辱。从 44 岁到 64 岁，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最佳的治学时光，却被无休无止的劳动改造、各种层级的批斗，一点一点地被耗尽。回首那个年代，没完没了的互斗互批、“背

靠背揭发”,实在令人扼腕!令人痛惜!

吴志达先生是当年程千帆先生门下主攻宋元明清文学的研究生,在程先生讲授《宋元文学史》的时候,曾随堂听课。他由于是程千帆先生的高足,同时也因为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采取精心设计、突然袭击的办法,在毕业分配去北京大学任教的前夕,突然召开针对吴志达先生的批判大会,旋即把他打成了“隐藏在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由此而遭受到20年的屈辱与苦难,不言而喻。师生两代人相似的人生遭遇,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心愿:发奋努力,不再虚度时光。只有了解了吴志达先生的这种心情,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1978年以后,吴先生熔铸个人生命体验,情真意切,深入灵魂的文学史研究。

吴志达先生从1978年被撤销处分以后,以外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退休以来他还承担国家文化建设重大工程,坚持学术研究,被学界称为“退而不休”的教授。他承担了《中华大典·文学典》副主编兼《明清文学分典》主编工作。《中华大典》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是对汉文古籍(含已翻译成汉文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分类整理和汇编总结的新型类书。大典按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分为22个典,全书共收各类汉文古籍3万余种,约8亿字,比《四库全书》还多,计划20年编成。吴先生自垫经费带领了一支甘于坐冷板凳的“子弟兵”,从事这个浩大的编辑工程,经过10年努力,2005年《明清文学分典》出齐,全书五巨册,共计1200万字。

在主编这部巨著的前后,1978年以来,吴志达教授还撰写出版了当时著名的国学基本丛书之一《唐人传奇》,还著有47万字的《明清文学史·明代卷》、56万字的《中国文言小说史》、60万字的学术专著《明代文学与文化》、校注出版了百万字的《水浒全传》、点校80万字的《东周列国志》及41万字的《元散曲新选》,执行主编多卷本《文言小说》,是撰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的副产品。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2011年,80高龄的吴先生倾全力修订其恩师程千帆先生上述的《元代文学史》讲义,增补、续写和扩充。长期以来,他深感这份《讲义》若因程先生的逝世而湮没,实为可惜。他认为,当初这部《元代文学史》讲义,是颇有特色的成果。它不仅客观系统地描述了元代文学的精华,而且也充分地展示了程先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独立寒秋的远见卓识。其精辟的观点、独到的方法,鞭辟入里的形象分析、入木三分的审美欣赏,在在都令人茅塞顿开,刮目相看。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56年,学术的规范从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当时由于只是为了授课而撰写的一部讲义,时间相当的仓促,有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当然,吴先生之所以在耄耋之年,克服重重困难,修订这部著作的真正原因,依然是师生两代学人的深情。吴先生曾对笔者讲,他有幸活到不再利用政治折磨人、不再搞政治运动折腾社会的新时代,深感修订出版程先生遗著《元代文学史》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年逾八旬的白发老翁,经过多年的酝酿,不懈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项冥冥之中的使命。程先生的在天之灵当可感到慰藉。

二

笔者把程千帆先生《元代文学史》讲义与吴志达先生修订出版的《元代文学史》作了比较,发现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原稿大约是十余万字,吴先生修订后的《元代文学史》约25万字,从篇章结构、文体研究分类、作家作品深入的分析程度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字里行间,两代学人的风范和精神,远见卓识与学术功夫巧夺天工,浑然一体。

第一,学术思想、学术风格高度一致。认真拜读这部文学史著作,我们会发现,全书观点鲜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而具有犀利强劲的思辨力。师生两代学人在意识形态特别是理论思维和艺术欣赏的心态方面具有高度的共同性,是这次修订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吴先生的指导思想是沿着原稿的思想脉络与艺术分析习惯发展,也就是尊重原著精神,增所当增(增其不可或缺的章节,例如元代诗文、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等),改所当改(改其因为时间的迁移现在看来不准确、欠妥当的内容)、删所当删(删其欠精

准的内容,例如《绪论》的某些部分),对全稿重新校勘讹误,核对引文,注明引文出处,全部统一加注,做出符合当代学术规范的处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修订后的书稿比原讲义字数翻了一番还多,但是一般读者恐怕不易察觉出于两人之手。当然,有些整章、整节增补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也会使读者感到,这些增补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对元代文学史的各位大家,除了对各个剧本作出具体分析的同时,还作了适当的增补,甚至用一整节的文字作出综合性的概论,使各个分散的论述整合成一个总体,把一部原始的讲义,整合成一部学术思想一致、体系完整的专著。

第二,吴先生在《讲义》的基础之上,增补元代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元代诗文两章以及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尚仲贤、李好古的神话剧,使元代文学史成为完璧。吴先生认为:“标志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戏剧和散曲,相比之下,诗、文、词就大为逊色了,但是,这不是说,除了戏剧、散曲,其他文体就不足道了。如果说,戏剧的作者与观众,主要是不屑仕进的文人和市民,那么诗、文、词则主要是中上层人士抒发性情、咏叹志趣或借描写景物以言志的载体,作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值得重视的文坛新气象是:不仅汉族诗人利用传统的文学样式进行创作,有些少数民族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人士也善于诗词,如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刺等。”^①吴先生受程先生的影响,十分注重作品文本的研究与分析。在笔者看来,这是这部《元代文学史》最大的特点。例如,吴志达先生增补的《元代文言小说》一节中,关于元代悲剧性传奇小说《娇红记》的分析,校勘翔实,从人物到思想,既有宏观的比较研究,又有阐幽表微的具体分析,情感激荡,大义凛然。可圈可点,击节赞叹!发前人所未发。吴先生写道:《娇红记》“其篇幅之长大,达二万余言;情节之宛曲、文笔之细腻、艺术形象之生动感人,可与唐人传奇媲美而自有其特色。这不能不说是文言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②对《娇红记》的分析既有横向的比较研究,又有纵向的文学史规律分析,鞭辟入里,炉火纯青,注入了吴志达先生独到的学术思想、情感与生命的体验。现引其校勘的文字如下:

本篇传奇小说以单篇形式收入《艳异编》、《情史类略》、《万景情林》、《花阵绮言》等文言小说总集中。郑振铎据以编入《世界文库》。或云为明初无名氏作,但明初已有刘兑《娇红记》杂剧,显然根据元人宋梅洞传奇小说改编,而掺入神仙之说;以大团圆为结局,这是明初戏剧的风尚,与宋梅洞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悲剧结局大相径庭,时代风格迥异。^③

如果没有作者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的学术背景,如果没有作者《中国文言小说史》的撰著,对元明清文学史的发展深入的研究,我们看得到遍布《元代文学史》中这样硬扎的文字吗?而且,没有特殊的人生感悟,没有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宏观的透彻把握,没有对作品本身深入细致的阅读研究,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来吗?

第三,在尽可能保持原著内容与风格的前提下,做了大幅度的推陈出新工作。作为诉诸学生听觉的讲义和主要诉诸于读者视觉的专著,其区别之一,就是在课堂讲授时,引用文献资料不宜多,必须考虑课堂教学的效果;作为学术专著,则力求避免空泛之论,理论批评必须建立在翔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之上。而且还要考虑到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程先生是学术权威,也难免半个世纪之前的时代局限性。吴先生从程先生与吴新雷教授合作修订的《两宋文学史》中,也受到启发,哪些方面是需要增补、强化的,哪些方面是应该予以淡化和改进的。有的是保留原著的骨架和要点,予以充实改进,融会贯通,彻底贯彻程先生的学术思想,是这部《元代文学史》最大的特色。例如,绪论和几位著名的戏曲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高明等)都是修订与增补得很好的范例。可惜文章篇幅有限,笔者不能畅舒其论。

第四,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讲义,按当今的学术规范,予以标准化处理,以利传播与接受。20世纪50年代的标点符号、章节标志、文献引用的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时代确实进步了。现在能够见到的文献资料,也比以前丰富多了。以往专家的私人藏书虽多,但也并非应有尽有,在边上课边写讲义的情况下,往往没有时间去图书馆进一步查阅文献。吴先生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在

①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元代文学史》手稿,第十二章《元代诗文》引言。

②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元代文学史》手稿,第十二章《元代诗文》引言。

③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元代文学史》手稿,第十一章《话本与文言小说》,第三节《元代文言小说》。

文献资料的丰富与建设上,应补尽补,系统、详尽地注明出处,力求规范化。这是一件了不得的艰巨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翻开《元代文学史》,吴先生的文献功夫,跃然纸上,令人敬仰。

第五,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象的内涵挖掘、艺术特色的分析都具有无法企及的深度,具有独特的理论魅力。《元代文学史》善于将较为复杂的问题,作透彻精辟的分析。例如,对高明及其《琵琶记》的分析,紧紧抓住人物、情节、心理的“矛盾”特征,依据作品本身,实事求是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站在政治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抓住时代的特征,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情节场景的对比性、艺术思想的矛盾性,彻底地展现出来,说明艺术创作实践会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有血有肉,对数十年来的学术界在《琵琶记》研究中某些学者的极左观点,是很巧妙的回答。有些作品的分析,例如对睢景臣的散套《高祖还乡》的分析,极富风趣而又老辣深刻,《元代文学史》说它“艺术地写出了伟大人物的渺小,揭穿了这个大人物隐藏在装腔作势后面的无赖和流氓的本来面貌,使人读后,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的快感”。这种笔调,这种行文的态度,其实是程先生与吴先生一以贯之的独立的批判精神。《元代文学史》写道:

睢景臣选取的镜头是刘邦刚刚还乡的那一场合,通过一位禀性异常纯朴,而又深知这位皇帝底细的人,在这个场合中惊异的眼光和继之而来的愤慨的心情,作家使得刘邦现了原形。为了精神上威胁人民,这位皇帝使用了大批的仪仗队,然而这些东西在人民眼光中却是那么古怪可笑。为了在感情上俘虏人民,他还在众乡老向他叩拜的时候,以手相扶,表示谦逊,然而这种动作在人民眼光中却是那么倨傲无礼。统治阶级虽然千方百计企图糊弄人民,然而人民的智慧总是能够看清历史的真相而将他们的“根脚从头数”的。这样,他们的企图就不能不破产了。

正是在这个地方,《高祖还乡》显示了他强烈的战斗性。^①

这种尖锐辛辣,极富批判精神而又妙趣横生、发人深省的文字,我们在当代中国同类的文学史著作上难得见到。

另外,《元代文学史》高度的科学精神、客观的治学态度,也是极其严谨的。例如,对有歧疑,尚无确论的问题,持慎重的态度。例如关于王实甫的身世和生卒年,吴志达教授在保持讲义原说不变的情况下,特作了两条注文,引用相关文献,供读者参考。对元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的论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吴先生指出,主要的问题是民族不平等,吏治黑暗,但是作家有创作自由,没有文字狱。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是谢枋得、郑思肖等宋遗老情绪化的说法。从元世祖忽必烈时就实现儒户享有免除服徭役的优待。对儒生不利的政策,主要是废除科举制度,一般儒生做官的机会少了。到了元仁宗延祐二年才恢复科举制。这都是《元代文学史》的作者极富历史穿越性眼光的学术高论。诸如此类,它给学术界带来的益处,产生的良好影响,必将在未来显示出来。

●作者简介:欧阳楨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元代文学史》手稿,第八章第三节《睢景臣〈高祖还乡〉》。